



论铁抗《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

——抗战文学的创作风格

A study of Tie Kang's *Shi Lian Shi Dai*, *Bai Yi*, and *Yang Wan Ju*: *War-resistance literature's writing style*

ULSZ3094 PROJECT II

庄雯静

CHENG WEN JING

18ALB0513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2

目次

| | |
|------------------------------------------------|-----|
| 宣誓..... | I |
| 摘要..... | II |
| 致谢..... | III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对象..... | 1 |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4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9 |
| 第四节 前人研究..... | 10 |
| 第二章 《试》、《白》和《洋》的主题意识：揭露抗战时期的血腥面和对马华社会的讽刺性..... | 15 |
| 第一节 《试炼时代》：揭露抗战时期的血腥面..... | 15 |
| 第二节 《白蚁》：讽刺马华救亡阵营的社会蛀虫..... | 18 |
| 第三节 《洋玩具》：讽刺英国殖民地教育的“伟绩”..... | 20 |
| 第四节 小结..... | 23 |
| 第三章 《试》、《白》和《洋》的人物形象：“社会蛀虫”的形象建构..... | 24 |
| 第一节 《试炼时代》的“坏”人物形象..... | 24 |

| | |
|----------------------------------|----|
| 第二节 《白蚁》“蛀虫”的人物形象：人性的黑暗面..... | 25 |
| 第三节 《洋玩具》崇洋媚外的“蛀虫”人物形象..... | 29 |
| 第四节 小结..... | 31 |
| 第四章 《试》、《白》和《洋》：原乡书写与本土性的纠结..... | 33 |
| 第一节 《试炼时代》的原乡书写..... | 33 |
| 第二节 《白蚁》和《洋玩具》的本土性书写..... | 36 |
| 第三节 小结..... | 38 |
| 第五章 结语..... | 41 |
| 引用书目..... | 45 |

宣誓

谨此宣誓：本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其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具体标明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庄雯静 CHENG WEN JING

学号：18ALB05134

日期：15/4/2022

摘要

本文主要以研究抗战小说的创作手法为视角，探讨铁抗的三部小说——《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并对比三部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文艺理论中的“原乡书写”和“本土性”进行对比，进而探讨铁抗抗战文学的创作风格转变。由于这三部小说皆属于抗战小说，所以他的写作手法都是在揭露战争的黑暗面以及讽刺社会蛀虫的存在。铁抗是一位现实主义提倡者，所以他的文艺作品都是与抗战期间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息息相关的。此外铁抗一直在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跟进时代的脚步所以他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的种种问题，将社会问题写入他的文艺作品里。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为《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进行主题分析以及人物形象探讨。纵观三部小说，铁抗在创作风格上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语言上，他又最开始的激昂渲染逐渐转变为冷静直观的叙述。另外铁抗创作风格的转变还体现在作品的选材方面，其中《试炼时代》是以“原乡书写”为主，而《白蚁》和《洋玩具》则是凸显了小说的“本土性”。

【关键词】 铁抗、《试炼时代》、《白蚁》、《洋玩具》、创作手法

致谢

眨眼间，我已经在拉曼大学度过了四年紧张且有意义的学习时光，并且来到了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我的大学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四年时间，我对文史哲各方面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深深的佩服中文系老师的学识，从中我不仅学习到中华文化，而且学到很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

在本次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我要感谢拉曼大学中文系给予我学习的机会。过程中有着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曾维龙博士从选题指导、论文框架到语言修改都给予我细致的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与推荐。在拟定论文框架时，曾老师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视角，以启发我对于此论文的思路。在此，感谢曾维龙博士的鼎力相助。

再者，我要感谢家人给予我的支持。在决定选修中文专业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和亲戚更多的觉得中文系并不会给我带来光明的前途，他们总认为中文系出生的我，只能走上教育这条道路。但是，家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劝说而阻止我选读中文系。在此，我想谢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无条件支持与谅解，以致我能够坚定地选择中文系并坚持到完成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此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姐姐，由于她亦是选读中文专业的老师，所以每当我遇到学业上的困难时，她都会竭尽所能帮助我，对我进行开导，并鼓励我继续坚持向前迈进。

接着，我要感激大学生涯中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会把论文发给他们阅读，并帮我修改我的文法。基于疫情关系，我们决定一起返回金宝的宿舍，相互照应，一起前往图书馆查找

资料，撰写论文。因为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并不像是在孤军奋战。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们总会陪伴在我的身边给予我无限的关怀及鼓励。

由于学术不精，笔者的探析只能达到浅显的境界，借此感到无比愧疚。笔者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学者能够更深入去探讨铁抗的文艺作品，并将铁抗这号人物推广让更多人认识他。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对象

铁抗，原名郑卓群，1914 年出生，本籍广东潮阳。铁抗笔名有铁亢、明珠、君羊、金铁皆鸣、金鉴和金箭。铁抗从十七岁开始创作，在汕头市写下了第一篇长篇小说《拥抱》。铁抗南来马来亚后，所发表的作品有小说集《试炼时代》、《白蚁》、《洋玩具》、《义卖》、《山花》、《阴影》，散文集《鮫岛，我的第二故乡》、《马来亚的风景》、《寂寞·渔港》，文艺理论集《马华文艺丛谈》以及戏剧集《父》。

1935 年是铁抗抗战使命的启蒙。¹他看着中国被日本侵略，于是决定离开汕头市，前往上海、重庆、香港等地从事文艺工作。1936 年，经其叔父的友人推荐铁抗漂洋过海南渡新加坡参与当地的文艺活动。1937 年至 1940 年间，铁抗在《晨星》副刊发表了散文、随笔和小说。1938 年的下半年，在《晨星》副刊上刊出中篇小说《试炼时代》。方修认为《试炼时代》是铁抗抗战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939 年五月，铁抗接编《总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倡导了“文艺通讯运动”。期间，他一边培养报告文学新兵，一边主持文艺界同仁杂志《文艺长城》的编务。由他主持的《世纪风》办得颇有特色。1940 年铁抗赶往邦咯岛（pulau pangkor）教书。直至 1941 年底返回新加坡，翌年 2 月不幸被日军杀害，年仅 29 岁。

¹陈岸怡，《铁抗文学作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6），页 2。

骆明说：“铁抗在推动马华文学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²南来马来亚的铁抗发动的文艺通讯运动，让马华文学创作更加大众化，推动了马华文学的发展。抗战时期，铁抗陆续发表了多篇抗战文学。与铁抗的理论批评以及散文集相比，他的抗战小说尤其突出。阅读文献发现学者更多对铁抗的抗战小说进行研究与讨论。铁抗作品多描写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战情况、歌颂马来亚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运动、描写日军的暴行、抨击那些厚颜无耻想乘机发国难财的小人。

铁抗在〈关于《南洋战时文学不适合论》〉提及：“战时文学的内容，是针对着一般及特殊的环境与需要，而且具适切的范围和灵活的性能的。”³根据其论述，第一，抗战文学所描写的是更全面、客观、准确地抗战史。目的是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决心。南来作家通过抗战文艺激励他们。第二，为了催促民众力量的动员使他们能与战士融洽相处。抗战小说的特征就是篇幅短，所写的字数极少。但是短篇小说要写出丰富的、生动的、活泼的内容是不简单的。即使抗战文学字数少，但是作家无法忽略小说人物性格的分析与心理的描写。

马华抗战文学的繁盛期是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卢沟桥⁴事变开始。这一变故让南来作家把目光都集中到动荡不安的中国，而抗战救亡运动在这一时期达到空前繁盛的景象。本文主要探讨铁抗的抗战文学。铁抗在马来亚陆续发表了多篇抗战文学，其中抗战小说的创作更为显著。铁抗的《试炼时代》反映的既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惊悸，颠沛流离的生活。内容还描写盘踞在当时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例如张建在小说的一开始一直持有中国传统的孝悌意识，这也导致他不得不孝

²骆明，《新华作家研究丛书（6）铁抗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社，2006），页3。

³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马来西亚：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1），页83。

⁴卢沟桥事件发生于1937年7月7日夜10时，那时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进行以攻取卢沟桥为假想目标的军事演习，之后日军一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城搜查，但遭到中国驻军严词拒绝。进而导致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在同一天炮轰卢沟桥和宛平城三次。

老爱亲并脱离了“北大青年学生宣传队”。《试炼时代》通过主人公张建性格转变，如初期张建在逃亡时依恋家庭的思想，在到后来逃亡过程锻炼出的抗战救国意志来反映出一个青年的觉醒。

此外，铁抗抗战小说所暴露的是华侨中某些靠战争聚敛钱财“蛀虫”对社会的影响，例如《白蚁》，铁抗于 1939 年 10 月 21 日至 31 日在《世纪风》发布。《白蚁》是一部具有讽刺性的文学作品。小说内容展示了诸多自私的敛财者。他们只为自己打响算盘，而不为国家。作者是以描写这些敛财者带出抗战救亡阵营中的黑暗面。《白蚁》的核心意义在于揭露抗战时期在马来亚发生的黑暗面，如人性的险恶。《白蚁》讲述抗战时期形形色色专门腐蚀救亡力量的蛀虫，铁抗在文本中将蛀虫当作“白蚁”看待。铁抗在处理人物形象过程中，每位人物的外貌乃至语言性格都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白蚁》也带给读者一个提醒，无论处于怎么样一个时代或战场，永远不要只关注前方的敌人，也要提防身后的一群蛀虫。《洋玩具》则于 1941 年 5 月 23 日至 28 日在《晨星》发布的中短篇小说。铁抗的《洋玩具》的故事背景记录了 20 世纪 30 年代受英国殖民地影响下的马来亚教育，是一篇讽刺性文学，故事的发生地是槟城。《洋玩具》中刻画的马奇烈性格懒散，整体只想看球，对“浑身香极了”的英国香水念念不忘。在内容上，铁抗反映了一些被当时社会否定的人物形象，作者通过人物描写表达抗战时期失去文化根源的民族，这也是抗战时期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之一。

新马华文抗战小说是受中国抗战小说影响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的新文学。铁抗是马华抗战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之一。铁抗在新马活动的六年间为新马华文学留下了几十万字的作品。即便他的一生写过很多文学体裁，如小说、理论、戏剧、散文等等。但他的抗战小说是最受学者们讨论与研究的对象。因此本论文主要以铁抗的三部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抗战文学的创作手法。文中会深入探讨铁抗的《试炼时

代》、《白蚁》、《洋玩具》在写作素材方面的使用、写作手法的特点以及艺术风格的表现。此外，马华文学中一直弥漫着“本土性”的影子，在探讨《白蚁》和《洋玩具》时会探讨文本中的“本土性”。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方修曾总结马华文学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三个方面，1937年抗战文学思潮是其中之一。由于1937年七七卢沟事件的发生，中国文艺界呼吁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激发了南来马来亚华人作家的中国意识。“救亡，抗战文艺”⁵的口号，“战时文艺运动”都是在1937年提出来的。抗战文艺的重要原则包括，一、战时的文艺作品成为了一种救国救民的武器；二、战时文艺作品应该有暴露和报告的能力，前者目的是为了剖开敌人凶残的丑态，使群众援助抗战，后者是为了使加强群众的抗战力量；三、将文艺力量作成一个新的动力，让群众更了解应该如何抗战；四、战时文艺作品须大众化，使其获得更为热烈的拥护。⁶抗战文艺作品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黄等。此外，抗战文学将重点放到中下层阶级的生活形态，暴露抗战时期社会的黑暗面，故而，其内容皆具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⁷

叶尼学者谈到：“战时小说不能如昇平时代长几十万余言。这是因为战争的发展形式非常迅速，战争时代走得太快，故其不允许每个能反映那一时代动态的作家们

⁵马崙，《马华文学之窗》（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7），页5。

⁶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页5-6。

⁷马崙，《马华文学之窗》，页13。

经年累月的写长篇小说。”⁸ 例如《白蚁》以及《洋玩具》都是用五至十天来完成的中短篇小说。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最主要是求真求实的叙述。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文学作品增加了其内容的可信度与艺术感染力。⁹抗战小说描写典型人物，典型事象，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而成。《白蚁》就是铁抗以现实主义的写法而创作。他利用丰富且深刻的经验刻画拥有浓厚社会意义以及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刻画，反映抗战时期社会上的“蛀虫”。在抗战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坚守岗位，尽自己的能力救亡。然而《白蚁》却反映了那时候的黑暗面。《白蚁》亦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范畴内的经典。

“抗战文学”是战争状态下产生，也是适应抗战时期的需求而出现的。学者金丁认为抗战文学就是与国防文学不同的，与过去一切文学也不一样的，抗战文学更倾向于一种需要配合着全民的持久抗战，其也应当通俗易懂，能够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¹⁰对于国防文学，鲁迅言：“国防文学指的是，作家在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是广义上爱国主义的文学。在文学方面国防文学主张‘进步的现实主义’来创作。”¹¹抗战文学书写是关于党派和阶级的抗战题材。虽然抗战文学是允许一切党派一切阶层的文学，但在性质上这个文学是民主的同时也限制一切违反抗战意义在文学上的个别发展倾向。简言之抗战文学虽然是自由的、民主的，但是无法体现抗战精神或是抗战时期社会的黑暗面的文学并不能纳入其中。抗战文学更能体现那时候的社会历史背景。抗战文学是国防文学的具体化、结晶化。抗战文学并非与过去的一切文学截然不同，反之是文学中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新文学。

⁸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页9。

⁹廖燕，〈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解蔽”内涵〉，《安康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页96。

¹⁰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页25。

¹¹蔡洞峰，〈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页60-61。

1937 年年初，马华文艺界出现了一批中国南来的作家，扩大马华文艺界的阵容，马华文坛开始活跃。这一时期，经历过西安事变（1936 年底）让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在中国准备迎接日本侵略的同时，海外华侨也展开了抗日战争的宣传活动。接着，七七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全面抗战就此展开，各界华人都卷入到这场救亡运动当中。马来亚的抗战文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戏剧等等都在这时段时间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由于马华抗战文艺运动中，南来作家深受中国影响，带有浓烈的侨民意识。导致早期的马华文学都带有浓烈的中国色彩，充满作家的思乡、爱国之情。

方修言：“抗战文艺就是这种轰轰烈烈的救亡热潮中的产物。”¹² 新马华文抗战小说是受中国抗战小说影响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的新文学，这一时期马华抗战小说创作的主力军都是南来作家。这时候的抗战小说更注重，其为抗战时期所带来的功效性。如，通过书写抗战小说支援中国救亡运动。铁抗的《试炼时代》就是南来后，受七七卢沟桥事件影响的产物。由于那时候铁抗南来马来亚仅有两年，并没有很了解马来亚的风土民情，加之中国刚发生七七卢沟事件激发了他的救亡，抗战意识，所以《试炼时代》仍旧采用中国大陆的背景作为题材使用。反观《白蚁》和《洋玩具》，创作年代已是南来马来亚的第三、四年，在经过观察、了解以及体验，铁抗对马来亚的认知也随之增加，所以其作品是以马来亚的抗战事宜作为背景题材。

中国抗战小说与马华抗战小说都是 1937 至 1945 年间出现的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所包含的种类繁多，其中有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等等。¹³中国抗战文学可以是写抗战的文学，亦可以是不写抗战的文学。根据曹万生和李

¹²方修，《新马华文学简史》（新加坡：星洲万里书局，1974），页 150。

¹³曹万生，李琴，〈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页 87。

琴的论述，中国抗战文学有两个类型：一、共时性的抗战文学；二、历时性的抗战文学。¹⁴共时性文学指的是作家在抗战时期写下的抗战文学作品；历时性文学指的是到如今仍旧在以抗战作为题材书写的作品。在中国作家的观念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作家战争记忆会消失，把战争记忆书写成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

然而，马华抗战文学在题材上所展现的是对本地人、事、物的兴趣与关注上，如书写异族他者、强调族群合作、再现本地居民的心理与感情挣扎与危机、反殖民地统治、探讨本地社会问题等等。¹⁵马华抗战小说前期的作品缺少“本土性”。《试炼时代》是以铁抗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反映了中国抗战时期中的光明面与黑暗面。

《试炼时代》的背景就不是在马来亚。显然，马华抗战前期的文学作品更富有“原乡书写”而缺少“本土书写”。从创作形式上来看，抗战小说的特征就是篇幅短，所写的字数少，不如昇平时代长几十万余言。¹⁶但是短篇小说要写出丰富的、生动的、活泼的内容是不简单的。即使抗战文学字数少，但是作家无法忽略小说人物性格的分析与心理的描写。《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都是典型的抗战文学。这三篇都是短篇小说，文中人物描写的焦点都能凸露其性格，让人物更鲜活。抗战文学的内容不仅关注抗战时期的积极面，其消极面也非常值得关注；不仅要写出未来的光明，还要暴露过去或是当前的黑暗面。如《白蚁》中的“蛀虫”以及《洋玩具》中在英殖民教育下的马奇烈都是抗战时期铁抗所看到的黑暗面。以铁抗的话来说：“战时文学就是在一切救亡运动主催人共同努力之下而展开的。”¹⁷抗战文学所包含的创作条件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所有抗战文学的共同点都是基于战争时期通过正确实践的形式。抗

¹⁴曹万生, 李琴, 〈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 页 87。

¹⁵许文荣, 孙彦庄, 《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9), 页 55。

¹⁶方修, 《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 页 9。

¹⁷方修, 《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 页 83。

战文学并不是一定要描述飞机大炮和血腥残暴的画面。铁抗的抗战文学就是通过人物刻画来讽刺那时候的社会情况。

铁抗在马华文坛出现的时间很短促，但是期间所创作的作品却不少，其中有小说、散文、理论批评以及戏剧。骆明的《铁抗研究专集》所收集最多的是学者对铁抗小说的讨论与批评。铁抗的小说类别是最显著、数量最多且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而散文对铁抗来说是次要的作品。散文方面更多的是描述铁抗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通过他的散文不难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华人社会的现实问题以及心态都是非常重视的。方修评论铁抗“他的小说，技巧圆熟，长于刻画人物性格，渲染环境气氛，同时代马华作者很少能够企及。”¹⁸ 由于铁抗南来马来亚时，正是抗战时期，其小说题材主要是以抗战事宜为主要内容，是一位成功的抗战文学作家。方修提及：“铁抗这种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跟着时代进步、不屈不挠地战斗的精神，永远是马华文艺界后来者的一个楷范！”¹⁹ 铁抗在人物塑造的方面非常出色，他可以通过文学将政治以及艺术融为一体而谈。通过阅读铁抗的文学作品也能看到铁抗那种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与时俱进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马华小说即使到了 1970 或 1980 年代，依然属于重要研究。黄锦树在说到 1970 年代的马华小说依旧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间接鼓舞。那时候“反映现实”的口号再次被提起。导致马华小说出现不少模仿左翼文学的作品，内容注重凸显阶级意识、刻画工人雇主斗争等等。²⁰随着马来西亚经济政策的调整，社会管制的松懈，1980 年代的马华小说重新以现代主义创作。“反映现实”和“健康文艺”不再是马华文学

¹⁸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上海：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79），页 2。

¹⁹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6。

²⁰张锦忠，黄锦树，《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台北：麦田出版，2004），页 8-9。

唯一的书写模式。黄锦树言：“小说不外是文字、结构和故事三合一产生的。”²¹小说文字不必然精雕细琢；小说结构是情节安排，叙述文字开端与结尾等技巧。例如《试炼时代》中张建为何要赴山西投奔林寿而不是他人？这是因为要让读者明白在战争情况下的弱势群体只能被迫面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下场。“小说题材固然重要，但如何叙述故事才是重点，小说理应将虚构的故事说成真理。”²²《白蚁》所要反映的是马华救亡阵营中的蛀虫是如何拖累救亡运动的，《洋玩具》则是揭露失败的英殖民教育。

内容方面，本文将集中研究铁抗抗战小说的修辞和艺术手法。首先，铁抗如何处理抗战小说的特征？铁抗是如何刻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抗战小说的艺术手法也包括了讽刺艺术手法。此外，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将铁抗的小说分为前期和后期。如，本论文要研究的《试炼时代》被归纳为前期的抗战小说，而《白蚁》、《洋玩具》则是后期的抗战作品。此外，本文也会探讨铁抗在写作手法上的转变，以及对作品中“本土性”以及“中国性”进行探讨。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使用了新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法。研究铁抗的抗战文学需要批阅其作品，文本细读是用以总结出作者在小说中是如何去塑造抗战时代下的人物形象。文本细读法是以强调文本语言和思想的关系，认为文本语言的功能和意义可以体现为意思、

²¹张锦忠，黄锦树，《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页 23。

²²张锦忠，黄锦树，《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页 23。

感情、语气和意向。²³文本以小说为文体，注重捕捉文本里词句的言外之意，通过了解词义及其语境来理解故事中讽刺和象征等。²⁴本文主要以“细读法”去解析铁抗的《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本文参阅小说理论书籍对铁抗的小说进行分析。铁抗作为蒙难作家，适合使用文本细读法对其进行研究以及探讨。在研究铁抗的同时可以发现很少学者对铁抗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文本细读法，笔者发现《试炼时代》、《白蚁》、《洋玩具》凸显出抗战时期下马来亚的社会历史。

此外，本文也将使用文献研究法来研究铁抗的文学作品。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铁抗抗战文学的重要性。文献研究法可以让读者了解有关抗战时期的文学以及历史，帮助确定研究课题。另外，文献研究法也能形成关于铁抗的印象且有助于让读者更了解铁抗的生平事迹。

本文将以比较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抗战前期和抗战后期的小说，观察抗战小说前后时期的主题、人物刻画以及文艺理论等特性。通过比较法，比较文本在抗战前期与后期的风格转变。

第四节 前人研究

关于铁抗的抗战文学作品，重要的书籍包括方修的《铁抗作品选》以及骆明的《铁抗研究专集》。

²³王先霭，胡亚敏编，《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30。

²⁴王先霭，《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148。

方修提出铁抗遗留给新马华文学的作品，最丰富且最显著的作品是小说创作。方修在前言部分写出了其对铁抗的评价：“铁抗在思想修养上不断赶向时代。南来之初，他的文章中经常可以发现若干杂质，然而后期却渐渐进入另外一种境界。”²⁵此书收录了铁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本文要研究的《白蚁》的文本，以及铁抗写的《谈讽刺》、《人物的描写》、《诗、散文、个人主义》、《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这些篇章也有助于读者了解铁抗的思想以及写作方式。此书仅收集了铁抗一生所写的作品，以及方修对铁抗的看法，这为笔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骆明的《铁抗研究专集》中，前三节都是学者对铁抗的研究和怀念铁抗所写下的文章。此书收入了6篇关于铁抗的生平的文章，可以了解铁抗的一生，从中国南来再到蒙难都有记载。此书亦收集学者对铁抗理论批评、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见解，让笔者对铁抗有着更好地了解。经阅读此书，笔者发现其中有7篇，皆是批评铁抗的《试炼时代》，足以见得，《试炼时代》是铁抗作品中重要的一部分。此书欠齐全，铁抗的作品有一些仍然没有被找到。并且，对于《白蚁》以及《洋玩具》这两篇小说，是没有学者深入探讨的。所以笔者需要通过阅读铁抗的主张，理论来研究他的作品。通过学者对铁抗抗战小说的批评，笔者可以从而得出新的看法与结论。

本文亦参考了方修编，2000年出版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以及《马华新文学大系（二）小说二集》。前者收录了学者对抗战文艺运动兴起的理论建设，而后者的导言，有方修对马华抗战小说的看法与分类。方修在导言提及：“《试炼时代》是抗战前期的小说；《白蚁》和《洋玩具》是铁抗抗战后期的小说。根据方修的分类，为本论文提供了便利。在论文的第三节，将会对比铁抗在《试炼时代》和《白蚁》的创作风格改变。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铁抗的抗战小说。此外，

²⁵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5。

《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收录了 4 篇学者对铁抗《试炼时代》的鉴赏与评论。此外，还有铁抗对《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的理解与看法以及各学者对铁抗抗战小说的评论及看法。例如学者黎明提出：“铁抗的小说题材多少与抗战有关，但是他的创作方法，已能够慢慢地把“政治性”和“艺术性”融合为一”。²⁶经阅读学者们的鉴赏与评论，为本论文提供了一些论证。

关于马华文学史的部分，主要参考方修分别于 1974 年以及 2006 年出版的《马华新文学简史》、《新马华文学六十年》，以及马崙 1997 年出版的《马华文学之窗》。这三本书都对马华新文学的抗战文艺运动做了详细解释。论文中提及的何谓抗战文学以及抗战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资料皆是出自这三本。由于本文研究的是铁抗的抗战小说，所以了解抗战文学是非常重要的。这三本书所记录的资料都是最完整、记录最详细的。可以通过取长补短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由于，方修在他的文学史当中，说明铁抗是现实主义者。本文也会在解读铁抗抗战小说的时候提及其小说中的现代性乃至现实主义。主要的参考书目有谢诗坚著，2009 年出版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此书不仅介绍马华文学底下的抗战文学发展，还详细说明了中国抗日文学是如何影响马华抗战文学的。这对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铁抗的《试炼时代》正是受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影响下的马华文学的产物。

在解读铁抗的《试炼时代》以及《白蚁》，主要参考的是陈岸怡的《铁抗文学作品研究》。文中详细介绍了铁抗的生平事迹并研究了铁抗的《白蚁》以及《试炼时代》。陈岸怡也在论文中提及铁抗在小说中是如何接发社会的黑暗面以及讲述了铁抗的小说创作最为出色的地方是他的小说人物的塑造技巧。由于论文研究的方向是关于

²⁶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页 388。

抗战文学，文中也提到了铁抗是如何通过《试炼时代》描述中国在抗战时期的人性、本能、暴力以及黑暗面。在解读《白蚁》的时候，学者提到了小说中的讽刺现象。陈岸怡认为铁抗在文艺理论方面对新华文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认为铁抗在新加坡活动的六年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文学和理论的精品。陈岸怡在论文中也表明了铁抗的文学作品当中，小说是最为出色且成功的文体，她的这一项观点与方修一致。

许文荣、孙彦庄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收录了铁抗的《白蚁》以及其文本解读。陈雪风解读了《白蚁》的人物群，里头对铁抗在描写《白蚁》人物的手法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与思考的问题。他认为铁抗在《白蚁》中的人物刻画是有用意的，铁抗的人物塑造可以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营造出一种气氛，使读者觉得人物的群像错综复杂。他认为凌乱是《白蚁》的缺点，但复杂却是小说的可取之处。然而，此书仅介绍《白蚁》这一篇小说，对本论文来说是不足够的。所以，这本书是作为辅助资料来使用。此外，本论文也参考了许文荣和孙彦庄在《马华文学十四讲》的观点。虽然书写抗战文学的作家大多都是中国子民，但经过日积月累在南洋书写，在抗战小说作品上流露出对马来亚的“地方感性”²⁷例如铁抗的《白蚁》和《洋玩具》都是直接取材于马来亚的现实社会。

本论文还参考了孔舒仪《新马华文抗战小说的“本土性”研究》的论点，因为“本土性”在马华抗战文学中更为显著。如前文所述，书写马华抗战小说的作家大多是中国子民，他们的心态会影响马华抗战小说“中国性”和“本土性”的演变因素。所以，本文将在论文的解读铁抗的三篇抗战文学的同时，谈一谈文本的“本土性”与“中国性”。本论文在处理小说集的时候需要参考学者是如何看待马华小说。本文参

²⁷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55。

考黄锦树和张锦忠《别再提起：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中的序，探讨了黄锦树对马华小说的看法。

张锦忠、黄锦树和庄华兴的《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所收录的第一篇小说是铁抗的《白蚁》。黄锦树谈到：“马华小说文本走过的岁月，也是国家与族群走过的历史轨迹。从建国到后殖民，马来亚经历殖民、日据、马共斗争、紧急法令等等……这些小说所书写的大叙事与小故事，也可以看出这几十年来国家与社会脉动。”²⁸《回到马来亚：华马小说七十年》中，铁抗的《白蚁》作为此书的开端。黄锦树认为《白蚁》是马华现实主义的小说。《白蚁》的第一句“1939年3月26日上午”与铁抗刊出小说的时间仅隔七个月。在时间线上，《白蚁》是“对当下现实发言，但不流于表相；尊重文学自身的再现逻辑。”本文会根据黄锦树的论点，继续探讨《白蚁》是否是社会写实主义小说。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书籍及论文以外，笔者还参考了其他文献，将会放在最后的参考文献当中，而不在这里一一论述。

²⁸张锦忠，黄锦树，庄华兴，《回到马来西亚：华马小说七十年》（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8），页7-8。

第二章 《试》、《白》和《洋》的主题意识：揭露抗战时期的血腥面和对马华社会的讽刺性

第一节 《试炼时代》：揭露抗战时期的血腥面

《试炼时代》是铁抗于1938年8月26日至11月1日陆续刊载于《晨星》副刊的中篇小说。同年中国正面临七七卢沟桥事件，导致他更关注中国大陆的抗战局势。铁抗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描述了主人公张建和家人如何在中国抗战时期期间生存的惊险过程。

历来，无数学者提出文艺是一面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中许多命题的镜子。文艺本身就是一个用于表达整个人生，而不是用以表达某一类或某一阶段的特殊事件或人的意向。²⁹年红学者表示：“一篇好的小说，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要用语文去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作者思想和感情”³⁰可见，文艺与社会的现况以及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试炼时代》中，铁抗揭露了日军在战争时期是如何实施暴力的、抗战时期的社会状况乃至百姓的自私行为都被铁抗毫无保留的写在小说当中。铁抗对“战争的暴力”和“血腥的气氛”写得很真实。例如《试炼时代》的开头形容战争逼近保定市的气氛：

**鬼子的炮火烧毁了宛平之后，就以燎原的趋势，像
马拉松火炬赛跑似的向平汉路南端及其附近速奔去。休养**

²⁹ 诸家，《文艺论坛》（马来西亚：马新印务有限公司，1983），页1-2。

³⁰ 诸家，《文艺论坛》，页22。

了三数年的华北平原又开始巧吟起来。野火的种子散落在她浓而宽阔的胸上，恶意地找寻农民稀有的财产和妻儿的生命作为食料。永定河早就给暴戾的射击手击伤，痛楚地诉苦着意外的灾厄。³¹

文章的开头就带出了战火逼近前的紧张气氛。里头也运用了象征修辞手法，如“野火的种子”代表的是即将来临的战争。此外，铁抗在描写各个县城沦陷的画面感也很强。例如“油秀娟丽的苏州，在什然并作的炸声里张开了几百个暗红的血口，溅起一坟坟污血”³²通过铁抗的描述，不难看出在战火面前人命是如此的渺小，炮火的到来就能将整个苏州染成红色的河流，随处可见的是在战火中牺牲的人。

在故事开头，作者就描述了“万福麟的东北部队违背了誓言，害怕起鬼子的火威来……他们抛弃了屏蔽保定的固安阵地。于是在野火的红光里，鬼子的炮队占领了这个要点”³³这里所揭露的是军人贪生怕死和自私的行为。正因为失去了这个要点，也导致附近的百姓成为了无家可归的难民。部队的存在是为了保卫国家，而不是在国家有难时，选择自保而弃百姓而不顾。此外，文中描写了战争发生时那些保定市县长与职员们甚至是警兵都会在“二句钟”内撤离，留下无处可去的百姓。由此可见，战争的黑暗面不仅仅是体现在日军入侵中国的暴力面，其中还包括上层阶级例如保定市县长、职员和警兵自私抛弃百姓，先行逃命的行为。铁抗也以此讽刺抗战底下上层阶级的黑暗面。

另外，在一片混乱当中总会出现一些乘火打劫的百姓，亦可以将他们称为流氓。他们的恶劣行为导致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文中就提到了：

³¹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09。

³²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79。

³³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6），页 309。

朝鲜浪人率领着当地流氓在瞬息万变的谣言中出现，于是比较热闹的大街突然发生抢劫，跟着就以极高的速度蔓延开来，直街横弄……许多刚关上门板的店家无抵抗地给撞开了，酒樽子、空烟罐、玻璃瓶、木箱子，散满在街心和小弄，不少店主人跟行劫的家伙扭到了街上，拼命地打开了。³⁴

间接反映了抗战期间百姓的生活不仅仅要提防日军的暴行，还要时刻守护仅有的家产。因为缺少了警兵的维护，社会上的蛀虫会借机吸干百姓的生活用品。此外，铁抗也描述了妇女和孩子在抗战期间的形象。如妇女们披着散乱的头发，想帮助丈夫赶走流氓却深知自己与流氓在力量上的悬殊。而孩子的形象是弱小无助的，他们只能胆怯的颤抖着。这也让读者领悟到，在战争面前妇女和小孩的力量多么的薄弱，他们甚至无法自保。

再者，铁抗在描写战争的场景时也非常生动。如第十二和第十三章，铁抗将上海到苏州如何一步步被日军攻陷都描写出来。如上海法西大火燃烧着、松江突然被占领了、上海失守了再到火线慢慢向苏州蔓延。铁抗将沦陷的苏州形容成“火的河，火的海”，这一描写为读者带来了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看见了爆炸发生后，四处可见血淋淋的画面。由此可见，作者揭发了战争时期的血腥面，也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战争是多么可怕。

³⁴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10。

第二节 《白蚁》：讽刺马华救亡阵营的社会蛀虫

曹聚仁之处：“文艺作品，必须是一面时代、社会的镜子，从那面镜子中照出众生相。”³⁵通过这面“镜子”，一个时代的背景以及社会面貌会呈现出来。作者可以通过小说创作，引起读者的共鸣，进而启发与教育我们。³⁶文学作品当中，讽刺性的目的是为了揭发存在与社会的问题。讽刺性可以将社会的黑暗面暴露在读者面前，从而引起读者的警惕性。在铁抗的《谈讽刺》里曾提及：

马来亚华侨社会是富有讽刺资料，而且急切需要‘文学上的讽刺’的国度。古旧社会遗留至今的愚昧，造成上中阶级的自私与虚荣……抗战发动以来，一方面，高楼巍峨烟尘十里的大都会流进了各种各样的人群，在国内失去了欺骗和榨取的机会的一些“绅棍”之流……进行欺骗善良人们的工作，或混进文化界，衣冠禽兽地居然以文化的传播着自居。³⁷

铁抗笔下的文艺作品都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当马来亚社会中出现“黑暗”或“腐败”的现象，铁抗将通过创作的方式加以批评和论述。铁抗认为讽刺在文艺技术上有着不可忽略的辉煌地位。铁抗把语言文字作为武器去抨击社会的黑暗面。这也是抗战文学当中最能带出警惕效果的创作手法之一。举例说明，铁抗的《白蚁》的核心意义是作者以讽刺性的手段揭发抗战时期在各个地方所发生的黑暗面。

《白蚁》在开篇引出了不少人物，这些关键人物都是铁抗以讽刺性的笔法刻画出来的。萧思义在铁抗的笔下是一位有着被“烟气熏黄”的脸的人物，也是萧伯益的

³⁵ 诸家，《文艺论坛》，22。

³⁶ 诸家，《文艺论坛》，页26。

³⁷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111。

侄儿。“夹在指缝间的那一节烟屁股，早就烧到不能再烧的地步……忽然一个哈欠，那烟屁股给猛吸了一下就丢到小天井里去了。”³⁸ 首先，萧思义是一个吊儿郎当且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形象。正因如此，他总爱在他人面前显摆自己的“知识”，张嘴既是虚夸不实的话。即便是吹嘘，他所言的事物以及地方都是不正确的。例如他说想到唐山和陕西延安去，但是他却把“陕西”念成“山西”；把“延安”念成“廷安”。这一听就让人看出他不懂装懂的性格。而且他的行为举止在外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就好像文中“斗鸡眼的客人”就存心在提及“陕西延安”的时候，把“陕”和“延”说得特别仔细。由此可见，铁抗是以讽刺的手法来带出萧思义并不是一个文化人，并且他的形象非常符合典型的富二代形象。

此外，萧思义之所以会到筹款赈灾分会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自己的叔叔——萧伯益一起购买假的“玛瑙鼻烟壶”。其实这并不是萧思义并非第一次欺骗别人。例如他还给别人卖了古玉花瓶和玉镯子，这些都是他以哄骗和博取同情的手段让身边的人以一百几十的价格买下来。那时候，一百几十算是非常大的数目。之后，萧伯益听闻萧思义要去延安反问到：

“延安？… … 你现在不抽烟？”那个刚要给个带着泪水的呵欠，给人家这么一说，就猛地取消了。“不，不！”几乎把头摇歪：“早就断墙了。”……“要到延安读抗日大学技鬼子去了，抽烟还成？我不像他们那班人哪，益叔！他们，什么救亡集，领袖集。国就不敢回去，还说救亡，噯！”³⁹

³⁸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96。

³⁹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403。

通过以上原文，不难见得作者以对话方式带出萧思义是个满口谎言且没信用的性格。从他那个“给烟气熏黄了的脸”，不难看出他并没有戒烟，但是他却对萧伯益说自己现在已经不抽烟了。可见他每一次说的话都是骗人的。所以萧伯益才会不信任他。加之，他在小说中还多次摆着一副清高的样子，并以抬高自己来贬低其他人，他总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上述例子提到，他认为王九圣、斗鸡眼客人等所谓的“救亡行动”都是无稽之谈。以收集救亡名单和领袖集，还不如像萧思义自己一样买鼻烟壶来赚取回国费用来得实际。由此可见他还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然而，当听闻别人提起抗战事宜，他却以说要到中国大陆去参战。铁抗就以一种讽刺性的写法带出萧思义其实是好面子且爱说空话的人。经过了解萧思义的人物形象，不难发现铁抗能过很精准的掌握那时候社会蛀虫的人物形象。

《白蚁》不仅仅是以萧思义作为代表来嘲讽那些吸附于抗战伟大事业的寄生虫。其中王九圣、陈鹏举、林团长等人都是抗战时期社会的蛀虫。他们各个居心叵测，为谋取私利不择手段。有关王九圣以及陈鹏举的人物形象将在第三章进行解析。另外，小说中的林某冒充铁军甲等团长的身份来谋取钱财。而且林某骗钱的目的是为了带姘头回广西开店，可见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文中各型各色的骗钱手段都能在《白蚁》当中看到，而他们的冤大头正是牙兰加地筹赈分会主席萧伯益。

第三节 《洋玩具》：讽刺英国殖民地教育的“伟绩”

《洋玩具》是铁抗于1941年5月23日至28日在《晨星》发布的中短篇小说。

《洋玩具》亦是一篇嘲讽英国殖民地教育对马来亚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小说的主人

公——马奇烈是一位峇峇，他父亲是唐人。但由于马奇烈是英校生，完全不会国语（马来语）。

“杜意伦，又想到他。可是这小鬼说的是红毛话，读的是红毛册，本身又是半红毛，每一样总比这教室里的小鬼强。”⁴⁰马奇烈经友人推荐到山芭华人学校教英语，但是他十分瞧不起他的学生。他甚至对比了山芭华人小学和红毛学堂，认为红毛学堂不会出现上课不认真听课，老师让温习却总盯着一个地方发呆的学生。马奇烈以“红毛学堂就没有这种角色。”⁴¹道出他对学生们的鄙夷和憎恨厌倦。由此可见，马奇烈虽然身为唐人，但是他却打从心底嫌弃着唐人的身份。马奇烈认为读红毛册便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身上仿佛镀了一层光。

正是自家的心肝儿杜那丝！杜那丝也来哪，这多好。她有汽车，一定坐汽车来；那汽车是一九四零年的流线型，开起来真快；自家会跟她并肩儿开过一趟，……那种香水一定是从伦敦祖家买来的。她父亲是伦敦人哩，可是母亲却是马来人。⁴²

原文的“可是”不难看出马奇烈是非常瞧不起马来人的，并且十分崇尚伦敦的一切，包括汽车、香水甚至是“伦敦人”的身份。即便马奇烈再欣赏外国文化，但他始终是个唐人，这种崇洋媚外的精神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当学生们问马奇烈：“马先生，这是什么旗？”⁴³的时候，马奇烈吱吱唔唔的说不出，然而学生们却知道那是中国国旗。马奇烈还顺带问了学生们关于中

⁴⁰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 501。

⁴¹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 503。

⁴²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 501。

⁴³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 505。

国地图和中国历史人物。可见马奇烈对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历史现几乎是一无所知。他的疑问让学生们不禁怀疑马奇烈就是红毛人而不是唐人。马奇烈的回答也很讽刺，他说自己是槟城人。即使到了山芭教学，他仍旧迷恋都市生活，一直想着逃离山芭华人学校，最后他确实成功“逃”回槟城。

铁抗以马奇烈与不同人物的对话带出了嘲讽的意义。马奇烈身为唐人，却不了解唐人文化以及历史道出了英国殖民地的教育所带来的恶果。⁴⁴ 铁抗以“洋玩具”作为小说的题目道出其中的讽刺性，铁抗认为在英殖民教育下，唐人（华人后裔）不过是一个任由洋人玩弄的玩具——“洋玩具”。因为英殖民提倡的英文教育已经成功让大部分马来亚公民忘掉华语以及马来语，例如小说主人公马奇烈。

⁴⁴ 朱崇科，〈卓尔不群论铁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页54。

第四节 小结

讽刺性的目的在于揭发社会问题，但它不具备解决问题的义务。讽刺可作为一种利器，将问题曝露在读者眼前并激起读者了解时代背景的作用。由此可见，讽刺的独特功能和效果让读者理解到，讽刺不会成为一种落后的、不具建设性的表现手法。

通过阅读《试炼时代》，其内容虽然是以揭露抗战时期的黑暗面为主。但是铁抗在树立小说主角张建正面的转变的同时加入了不少讽刺性内容。铁抗的一生嫉恶如仇，在处理《试炼时代》中坏人的下场是铁抗“行侠仗义”的证据。但是铁抗在小说中铲除一切恶势力时还不忘将现实会发生的情况一并描写。

《白蚁》让读者有机会接触到人性的暗黑世界，其更是揭发了上层阶级社会人士是如何趁乱谋财获利的。铁抗通过《白蚁》嘲讽了那些不但没投身于马华救亡阵营且还吸附于抗战伟大事业的寄生虫们。铁抗的《洋玩具》则是从题目就能看出嘲讽之意，小说内容毫无疑问就是在讽刺英国殖民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恶果。那时候马华社会由于受到英殖民教育的影响，导致许多唐人（华裔）不会说国语（马来语）甚至是自己的母语（汉语）。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然而却是抗战时期马来亚所发生的局面。作者就以《洋玩具》道出华人后裔在英殖民的教育下，不过是一个“洋玩具”。铁抗也成功以讽刺性的手法带出马华救亡阵营中的各种社会蛀虫以及讽刺英殖民教育的“伟绩”，并且发挥了文艺作品的警惕作用。

第三章 《试》、《白》和《洋》的人物形象：“社会蛀虫”的形象建构

第一节 《试炼时代》的“坏”人物形象

除了从写景方面带出战争时期的黑暗面，在《试炼时代》也通过刻画小说人物以及剧情以便能够揭发战争时代的黑暗面。如故事开头介绍张建的叔叔——张川。张川是保定市的地主，属于上层阶级的人民。张川为了自身利益以及安危，命令家人在保定沦陷前制作日本的国旗，以便示好。他联合保定的朝鲜浪人金利宗接应日军，希望自己与家人在未来的日子能当“鬼子的官”。负责给日本人“提供”夫役、姑娘和劳费。透过铁抗对张川的人物形象刻画，可以揭发在抗战面前上层阶级和富贵人家的自私心理。只要自己和家人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在他们眼里谋财获利、出卖祖国、迫害百姓甚至是残害亲戚都是不足挂齿的事情。

第二个“坏”人物形象是山西介休的地主林寿。林寿和张川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利用职权剥削村民；一个是为了自保而迫害百姓。林寿是主管“村公所”的一名小乡官。他以公谋私，乘战乱时期夺取村民的财富和资源。例如文中县长给村公所批准下来的公债额是五百块，但林寿却欺骗村民是三千块并将这些公债额的用途美化，说是用于救国公债，要购买枪械、组织自卫队等等。为此林寿利用自己的权利逼迫每户人家在三天内必须交出十五块。在那时候，十五块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很庞大的金额，很多家庭根本拿不出这十五块。而这时候，林寿便强硬地夺取他们的鸡鸭牛羊等生计，甚至将不服从者关进牢房。林寿的种种行为很自私也很可恶。由此可见，铁抗

通过刻画张川和林寿使用以揭发战争时期上层阶级的人们是多么的自私且恶毒，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现况。

铁抗对于自己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坏人没多少同情，例如张川再次见到张建一家是还是忍不住忏悔，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法保住家产，最终还丢了自己的性命。而张川的太太和两个女儿，也没有幸免于难。他们也在战火中赔上了宝贵的性命，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林寿的下场则是在日军攻进介休时当了日本人的“官”，虽然没有像百姓一样一直避难，但是林寿最终被无名者砍下了头。而林寿的死还给无辜的村民带来杀身之祸。因为日军一气之下枪杀了七十多位无辜的村民，并将整个村庄烧成平地。铁抗给予坏人的结局也让读者看出坏人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些人物的结局也清楚地表明了铁抗的正义感，他对恶势力是毫无包容之心。然而不难看出一个道理，坏人的“报应”不仅仅是害己，还会牵扯到许多无辜的人。

第二节 《白蚁》“蛀虫”的人物形象：人性的黑暗面

前文提及，《白蚁》作为铁抗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讽刺性的文学作品，亦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作者把抗战救亡阵营中的黑暗面以文艺的方式记录下来。其讲述抗战时期形形色色专门腐蚀救亡力量的蛀虫，作者在文本中将其当作“白蚁”看待。小说开头介绍了五个人，而这些人正是那时候那些抵制日货，赈灾救国（中国）的海外华社以外的一群败类。他们假借“筹赈”、“护侨”、“铁军”、“延安抗日大学”等各式各样救国名义对海外华社进行招摇撞骗。

铁抗在处理《白蚁》的人物形象过程中每位人物的外貌乃至语言性格都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铁抗在《谈讽刺》这篇文章中说到：“古旧社会遗留至今的愚昧，造成上中阶层的自私与虚荣；我们试一冷静地观察一些上流人物行善好义的行为，便不难明白在那些行为后面的是潜伏的虚荣心。”⁴⁵《白蚁》是铁抗在这一思想及观察的基础下所创作的作品。铁抗发表了《白蚁》之后也险些遭到同乡的毒手，险些丧命。可见《白蚁》中的人物自私又虚荣形象是真实存在的。

《白蚁》中王九圣是一个典型的销售员，手中总是携着一个公文袋，里头装着一本“马华救亡领袖录”。王九圣以“抗战的领袖们应该得到更高的注目”的借口，欺骗领袖让他们为印刷宣传单的捐款。王九圣看到会捐款的冤大头，他便以自己巧舌如簧的技能来游说他捐款。即便从未见过面，他都可以声称认识对方，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作者还形容他有“蒜头气味”的口臭，但又偏喜欢靠得很近说话，弄得周边的人都“喘不过气”。铁抗的形容很滑稽，但是却在视觉效果上给读者很大的冲击。王九圣也像一般的销售员，喜欢“偷偷看别人的神色”，还习惯用“一只耳朵”旁听别人的谈话，目的是要彻查别人是否有意思捐款，若气氛、情绪稍有改变，他便可随机应变。文中，当集合到筹募分会的人都还在等着主席的到来，王九圣主动向萧思义问候：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萧思义先生！嚟！我们从前在星加坡会过面的，现在就两个月嘛！热带的时日，真是真是……”那个萧思义的怔了一下：“我没有在星加坡住过。”他忍不住哈了个呵欠。……“对了！咳！我这记性总这么不对劲！我们是在擦挪吗见过面的。萧先生你那时候忙着募捐筹募，忙板了，是么？”⁴⁶

⁴⁵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15。

⁴⁶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96。

由此可见王九圣死缠烂打的性格。他只要碰到有半点可能会捐款的人，他都不会放过机会。作者多次描述他认错人的场面，维度不见他脸上的难为情。作者以讽刺、幽默的手法加以渲染王九圣不知羞耻的作风。王九圣这种为达到目的而不知羞耻的精神非常符合救亡运动的社会蛀虫形象。

《白蚁》里第二位社会蛀虫形象的是护侨社社长——陈鹏举。在小说的第一段，铁抗以“斗鸡眼”的客人形容了陈鹏举的外貌。最开始阅读之时，读者可能会认为一个在谈话间只会先看看自己的鼻梁，再看对方的陈鹏举是个老实且自卑的人。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会发现陈鹏举是一位非常现实的人。他是一个目的性非常明确的人，并且不会与和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有过多的交谈。当陈鹏举听闻萧思义要到陕西延安去的时候，原本嫌弃萧思义的他瞬间看得起了。

“现在回国真个麻烦极了。没有证明书吗，你就别想在祖国登岸。海关会弄得你头疼……但是敝社劝他们咧！别怕给你一张证明书，声明是护侨社社员，要是关员再故意刁难，好，东西给他，跟他要收据，然后报告上来，准把东西追回，还要给他一个钉子碰……所以谁要回国，谁都得跟敝社商量！”⁴⁷

陈鹏举听到有人要返回中国，他便会兴奋起来，开始为“护侨社”打广告。说什么登记加入社团只需要付费一块钱便能得到证明书通行中国。他还给萧思义等人说了多得的好处，类似遇到任何通行问题都可以联系广东的总社协助。由此可见，只要遇到有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陈鹏举都会尽力拉拢人心。

⁴⁷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398。

另外，陈鹏举之所以会来到筹赈会的原因与其他人一样，是为了敲诈筹赈会主席萧伯益捐献给护侨社社团。陈鹏举与王九圣在麻将桌上的一段对话：

“对的。你的救亡录募到多少印刷费了？”护侨社社长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上来，又看定了自己的鼻梁。主席的侄子，却在吐唾沫，黄庶务高兴地淘着眼睛。”

“说起来头痛，不过几百块，满想捐二千的，但是现在头痛之极。”实在觉得闷气，头痛得很！

“贵社可以维持么？”跟着问。

“还好！”斗鸡眼满高兴的，还想起了财政答应捐赠的五十块钱。⁴⁸

与王九圣还未筹到救亡录的印刷费相比，陈鹏举以及达到了来筹赈会的目的，他以及得到了筹赈会捐赠的五十块钱。然而他这般“明知故问”的举动，明显透露出他是个心机很重的人。⁴⁹虽然铁抗对陈鹏举人物的描写篇幅并不多，但是从他的谈话间却能清晰掌握他的性格。铁抗对陈鹏举的描写是生动的。人物描写的重要性在于，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后，能够清晰记得起他的面貌形态，并且也能说他的内心隐秘密。⁵⁰铁抗通过陈鹏举间接讽刺着中上阶层的“社会蛀虫”。即使身处战乱时期，他们仍旧借着自身中上层阶级的影响力，从中谋取私利，甚至借此发大财。即便知道他们的龌龊行为，人民却无法反抗甚至是举报他们，因为他们所处所在的社会阶级和所拥有的资源是战乱时期无法被动弹的存在。

⁴⁸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414。

⁴⁹ 陈岸怡，《铁抗文学作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6），页24。

⁵⁰ 冉欲达，《文学描写技巧》（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页121。

经过对《白蚁》人物形象的分析，不难发现铁抗是在通过人物刻画带出中上层阶级的丑恶面。铁抗也借此提醒着读者，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年代，永远不能只关注前方的敌人，更要注意身后隐藏着的社会蛀虫。

第三节 《洋玩具》崇洋媚外的“蛀虫”人物形象

《洋玩具》的故事背景是为了记录三十年代受英国殖民地影响的教育，是一篇讽刺性文学。在内容上，铁抗反映了一些被当时社会否定的人物形象。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奇烈。首先通过阅读，读者可以通过作者对马奇烈的人物塑造，如他的思想、言行举止以及他身边的峇峇朋友——峇实都在说明马奇烈也是一个峇峇。⁵¹ 根据陈志明的记载“峇峇”的所在地多处于马六甲以及马来西亚独立前的槟城。⁵² 小说在最开始就提到“在槟城多好”，这一点也足以证明文中的马奇烈是槟城人，也是一位峇峇。

《洋玩具》的主人公——马奇烈从小就读“红毛册”，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马奇烈眼里，那些不会说英语的学生们就是“峇米”。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半红毛人——杜意伦眼里，马奇烈也被称为“峇米”。由此可见，铁抗想要借此表达马来亚民族是失去文化根源的民族，在英殖民的统治下，许多人民开始崇尚英文教育，导致许多唐人已经忘了国语（马来语）甚至是母语（汉语）。然而在“红毛人”甚至是其他民族眼中，仍旧遭到鄙夷。

⁵¹ 黄宝琪，《马华文学中峇峇娘惹的形象刻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士学位论文，2011），页22。

⁵² Tan C. B.,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 108.

马奇烈在峇实的鼓励下，走出已经被英殖民教育祸害的槟城，走到穷乡僻壤的华文学校去当英文老师。马奇烈希望可以借此学习华语，并在将来进入政府机构当翻译以赚大钱。然而非常可笑的是，马奇烈的父亲是唐人（华人），但是马奇烈却不会华语。此外，在任教期间马奇烈一直在轻视那些不懂英文的学生，甚至一直拿华校和“红毛学堂”进行对比。因此他一直没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再看张家槐那小鬼，坐得直挺挺的，眼睛比桂圆子还圆，好像在想什么，而其实，别说哪吧，糟得很，没有一次会将红毛册一字不错地读出来。……再看，那个呆姑，王君丽，又呆又胖……

譬如说，杜意伦这半红毛孩子，虽说老骂人家“峇米”，可是红毛话总说得挺好。当今说红毛话说得好的都是了不起的角色，将来一定挣大得大钱。⁵³

原文可以看出明显的对比。在马奇烈眼中，华文学校的学生是一文不值的，不仅邋邋还不懂英文。对于他的学生，马奇烈虽然身上有着华人血统，但是他却不能以唐人话在教学上对学生们解释英语课文。甚至还需要班上的学生为同学解释。马奇烈连“Rabbit”的唐人话（汉语）也不能翻译。更甚的是，在校长要求他写自己的中文名字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马大奇”。通过他与学生们的对话，还可以发现他对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一窍不通。相反的，从马奇烈对比他的学生以及杜意伦，不难看出他对西方文化的崇拜程度。即便他不喜欢被杜意伦称为“峇米”，但他还是认同杜意伦的，并且非常崇拜杜意伦爸爸是伦敦人的身份。

铁抗把马奇烈的人物刻画成“洋人的玩具”。马奇烈是英殖民教育“伟绩”下的例子，他父亲虽然是唐人，但他不能以唐人话与同事沟通。马奇烈一边不能忍受学

⁵³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 502-503。

生们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却要问长问短，一边却从学生们的口中认识自己的祖国（中国）。在《洋玩具》里，马奇烈在谈话间透露着他对西方文化的崇拜程度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阶段。峇峇作为土生华人，即中国移民与东南亚原住民通婚的混血后裔，⁵⁴马奇烈的爸爸是唐人，照理说马奇烈是不可能不会汉语的。但由于受到英殖民教育的影响，马奇烈从小就读“红毛册”（英文书）因此导致到华文学校当老师的时候无法以唐人话（汉语）在教学上对学生们解释英文课文。

通篇而言，铁抗没有对马奇烈这个峇峇人物进行批判，而是以一种讽刺的手法去揭露了在英殖民的教育制度下，受英文教育的马奇烈被教育为缺乏责任心、贪图享乐的处事态度，间接的暴露了这种教育制度的“功绩”。

第四节 小结

方修曾说过：“他的小说，技巧圆熟，长于刻画人物性格，渲染环境气氛，同时代的马华作者很少能够企及。”⁵⁵通过分析铁抗《试炼时代》的人物形象，铁抗在刻画坏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下场时，也领悟到了“正义”即便存在，却不是完全公道的。此外，不难发现里头“社会蛀虫”的人物形象是可以从阶级概念而谈。例如前文所介绍的张川以及林寿都是上层阶级的人物，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帮组人民解决问题，甚至还自私地只为自身利益着想。《试炼时代》中，社会蛀虫的人物形象揭发在抗战面前上层阶级和富贵人家的自私心理。

⁵⁴ 黄宝琪，《马华文学中峇峇娘惹的形象刻画》，页 24。

⁵⁵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2。

此外，《白蚁》当中的人物形象则偏向阶级上的黑暗面。从人的社会特征来谈，《白蚁》所展现的是资本家丑恶面。例如铁抗在《白蚁》的人物塑造，他是以每个不同的人物带出他们在马华救亡阵营的“蛀虫”活动，例如以欺骗手段谋取钱财。反观，《洋玩具》则体现了人性上的丑陋面。《洋玩具》中铁抗虽然没有明确地对马奇烈进行批判，但是铁抗却用了讽刺的手法揭露在英殖民的教育制度下，唐人受英文教育之后，忘了汉语。马奇烈不仅在教育过程中缺乏责任心，他贪图享乐的处事态度亦是不可取的。另外，铁抗以马奇烈的人物形象间接暴露了 1930 年代马来亚在英国的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伟绩”。

文艺与社会的现况以及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作品当中，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现象以及每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更有甚者能够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四章 《试》、《白》和《洋》：原乡书写与本土性的纠结

第一节 《试炼时代》的原乡书写

铁抗的小说内容可以分为两个种类。首先是以中国大陆的抗战局势背景作为题材，如《试炼时代》。再者是以马来亚的社会环境作为故事背景的题材，如《白蚁》和《洋玩具》。

由于撰写《试炼时代》的时候铁抗方才南渡新加坡两年有余，那时候的他对于南洋还是不熟悉的。《试炼时代》是以铁抗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反映了中国抗战时期中的光明面与黑暗面。虽然 1938 年，铁抗来到马来亚已有两年，然而《试炼时代》的背景却不是马来亚。可见，铁抗抗战文学前期的作品更富有“原乡书写”。所谓“原乡书写”指的是身在马来亚的中国侨民，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以缅怀式、记忆，甚至可以在作品上看出作者满怀乡愁。

铁抗认为“将祖国抗战的题材加以组织，形象，置于马华读者（或观者）面前，使他们把握到抗战的中心意义，从而组织他们，教育他们；这，虽然不是地方的题材，却发挥了地方性的效果。”⁵⁶ 透过“原乡书写”，小说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中国的眷恋。

⁵⁶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08。

作者给文中的人物与文字赋予微妙的情感。作者透过文字，维护了华人文化的愿望与理想。⁵⁷

新马华文文学在抗战前五年（1937-1942 年）是华文抗战小说的兴盛期。由于南来作家努力宣传抗战口号，新马华人始终对中国抗战有着密切关注。所以当战争的火焰蔓延至新马之时，有了作家们的鼓励，新马华人得以直面战争的硝烟与残酷。这也说明了，铁抗在人物的刻画以及故事背景的描写成功警醒了新马华人的爱国精神。这些作品激发了新马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热情。⁵⁸此外铁抗的《试炼时代》鼓动了新马华人一致抗战的决心与斗志。

铁抗作为现实主义代表，他的抗战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虽然是经过描摹的，但是却也是曾出现在现实战场上的血肉之躯。现实中，他们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留存至今的是他们为保卫国家而不放弃的精神。例如在《试炼时代》里，铁抗塑造了一系列生动且贴合战争时期的人物形象。铁抗的《试炼时代》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包括上层阶级欺压人民，为日军卖命；下层阶级则展现出战争下生活的艰辛。小说中的青年更是不畏生死，为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事业的代表。即便处于年少时期，他们也心甘情愿地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可见，铁抗抗战文学的书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亦是折射出作者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思念之情。但由于无法回国，只能通过发表文学作品，宣传抗战精神。

如前文所述，铁抗《试炼时代》不仅刻画了战争环境下不一样的人性。这些人物的性格包括家与国、孝与道等大义情怀。⁵⁹文中的主人公——张建是一位爱国青年。但是张建的性格优柔寡断，导致自己在家庭与抗日运动间犹豫不决。他一边担心家中

⁵⁷ 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论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页 40。

⁵⁸ 孔舒仪，〈新马华文抗战小说的“本土性”研究〉（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页 6。

⁵⁹ 孔舒仪，〈新马华文抗战小说的“本土性”研究〉，页 7。

老母亲与即将生产的妻子，一边又担心国家的安危。但是在逃亡的路上，张建目睹了张川愚昧无知的行为，例如张川为了自身的利益，联合保定的朝鲜浪人金利宗接应日军，希望自己与家人在未来的日子能过得更好。张建也目睹了表哥利发贪婪成性以及林寿为了自保而残忍凶狠大发国难财以及迫害百姓的丑态。这些人物的刻画成功带出人性的丑陋面。在战争环境下，人性本恶会被无限放大，显得刺眼。

张建就是在这个同时要保卫国家又要照顾家庭的情况下，内心备受煎熬。然而，优柔寡断的性格也让张建失去了刚出生的孩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在经历了逃亡过程的变故让张建与妻子逐渐成熟稳重。自从失去了家人，张建也不再犹豫，保卫国家的精神再次燃起来，各自重新找回了人生方向与目标。笔者认为，作者之所以会以正面描写张建的思想转变是为了达到一种警惕的作用。因为读者可以通过张建了解到，只有保卫国家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铁抗认为战争亦是一场试炼，它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只要勇于抵抗恶势力，人生价值也会随之实现。这也体现了小说的“原乡书写”。这证明了铁抗的文艺理论，既小说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中国的眷恋以及把握到抗战的中心意义，通过阅读《试炼时代》我们可以看出铁抗是以写中国抗战血腥面的手法来警醒了新马华人的爱国精神。

第二节 《白蚁》和《洋玩具》的本土性书写

铁抗曾经提过：“一切艺术作品应该充分地凸露她的地方性。”⁶⁰“地方性”是一个较大的概念，铁抗认为一部拥有“地方性”的艺术作品应当题材源于马来亚的社会面貌或是风土民情，其次，作品主题应该达到教育马华社会的目的。第三，读者可以艺术作品看到“南洋色彩”。⁶¹本土性（localness）是地方性概念底下，是具有本地（马来亚）色彩的方方面面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本地的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自然景观、语言文学等。⁶²艺术作品里头本土性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以自身了解的“在地知识”或者本地人的视角去创作艺术作品。铁抗在《马华艺术的地方性》指出：“以为作品上所要求的地方性不过是地方自然色彩的敷衍。因为作者写的是马来亚的人事风物，自然免不了要将故事的背景写得十足具有马来亚气味；既是说：不但要将热带的景色认真的敷衍在文字上，而且得将马华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描写出来。”⁶³换言之，南来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会把马来亚的风土民情写进他们的艺术作品当中。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期间，中国五四新文学对新马华文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南来作家的作品大多以中国抗战作为故事背景，从而达到宣传抗战口号。如前文所述，纵然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仍然具有浓烈的中“原乡意识”，然而从中可略见一二具有本土风情的抗战小说关于具有“本土性”的抗战小说的书写。随着事件的推进，南来作家逐渐适应新马文化之时，部分作品开始出以“南洋”作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富有“南洋色彩”的作品让文艺副刊也开始有了本地色彩的渲染。

⁶⁰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07。

⁶¹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07-110。

⁶² 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论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华文文学》2010 年第 96 期，页 40。

⁶³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08。

例如《白蚁》，铁抗在创作的时候大量使用口语化的对白，在语言结构上的排列也更偏向方言化。萧思义在小说中提到自己来自槟榔屿，而他之后在雨叔叔萧伯益对话的时候说到：“廿块叻纸，”⁶⁴很明显这是马来亚方言——闽南语表达的。“林德明！陆军步兵科毕业的，在这里闲居了四年，等下子就要到这里来，你没看过报纸？”⁶⁵在大量的对话当中，不难看出铁抗有意将马来亚的口语甚至方言融入到里头。例如“等下子”到现在马来西亚仍然沿用至今。“筹赈会？五十巴仙……本钱二分，卖价六角，实赚二角八分”⁶⁶，“噯，这里，这里，二块”⁶⁷以上例子在数字上的说法都偏向马来亚的地方语言。例如“五十巴仙”和“二块”，指的是“百分之五十”和“二元”。铁抗在《白蚁》中透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带出他们的性格，在传达讯息的同时增加了人物之间的互动性。通过口语化的对话，也带出了人物“新鲜，活泼，通俗而具有深入能力”⁶⁸，南来作家所描写的通常都是闽南语以及粤语的人物。

除此之外，铁抗希望能通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间接地渲染作品的“本土性”。唯有这样才能凸显出《白蚁》的“南洋色彩”。但是南洋地带的口语繁杂，不仅仅有马来语，当地华人甚至还会使用闽南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等。甚至有些字眼是由英语音译而来。所以南来作家要掌握南洋的语言色彩并且融入到文艺作品里是非常困难的。

铁抗的《白蚁》和《洋玩具》皆有运用大量通俗化的口语来写下人物之间的对话。在《白蚁》和《洋玩具》里头铁抗有运用了南洋语言音译而来的例子。首先在《白蚁》里，“姘头”多数适用于闽南语，其代表“情妇”之意。“中意”则是现如

⁶⁴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405。

⁶⁵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404。

⁶⁶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407。

⁶⁷ 骆明，《铁抗研究专集》，页 414。

⁶⁸ 朱崇科，〈卓尔不群论铁抗〉，页 53。

今大家所熟悉的粤语演变而来，代表“喜欢”之意；“巴塞”则是由马来语音译而来，指的是菜市场。在《洋玩具》里头，最常见的就是“红毛册”和“红毛人”。“红毛”在闽南语里读作“ang mo”，是“英文”的意思。“红毛册”指的就是英文书。此外，在形容王君丽的时候，马奇烈说到“呆戛戛”，用闽南语说就是“dai gong gong”。指的是呆傻或者发愣的样子。由于马奇烈是槟城人，所以这里的翻译更多是以闽南语而非粤语。

总而言之，随着战争的推进，抗日战争已经不仅是在中国燃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其中包括新加坡以及马来亚。1940年代，许多南渡马来亚的作家也逐渐适应了马来亚的风土民情，抗战小说的书写开始关注新马社会。作家开始以冷静的笔触刻画马来亚本土形形色色的百姓，具有“本土性”的抗战文学也逐渐在抗战小说中展露头角。华人作家身处新马便将“南洋色彩”描摹于作品中。

第三节 小结

《试炼时代》是以铁抗的祖国作为故事背景，然而到了《白蚁》和《洋玩具》，铁抗的写作背景已经改为马来亚。

“原乡书写”和“本土性”是不一样的。小说中的“原乡书写”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中国的眷恋。作者透过文字，维护了华人文化的愿望与理想并带出了作者对祖国的思念。作者在创作之时会融入“战争的发展态势”。新马华文抗战小说书写类型包含对“中国抗战”的原型书写，以及将视角置于新马社会描写普通百姓在抗战环境下

的生活情境。⁶⁹正当中国身处战争之时，以中国抗战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成为主流，其内容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性”。铁抗的《试炼时代》是以战争的残酷为主题，在构建正面人物的同时，积蓄饱满的抗战热情。

此外，在挖掘新马华文文学不难发现其离不开地缘、风情、视角、思想、情怀、文化乃至精神品质。再者南来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融入马来亚，他们开始认同马来亚政治甚至是开始适应马来亚的风土民情。随着战争的蔓延，新马社会逐渐受战争侵袭，新马华作家有了保卫马来亚的自觉意识，出现了以新马社会为视角的抗战小说书写。这亦是“本土性书写”。通过对铁抗作品的分析，不难发现《试炼时代》到《白蚁》以及《洋玩具》的写作风格也有了转变，作品由激昂的文字渲染逐渐转变为冷静直观的分析。

铁抗对《白蚁》和《洋玩具》的人物形象塑造，展现新马社会面貌，以及普通百姓抗战时期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正是新马社会在抗战时期的缩影。小说中的马来亚方言更是凸显了马华社会的风土民情，完全呈现了与中国风景截然相反的情境。⁷⁰通过对比“原乡书写”以及“本土书写”，铁抗创作手法上的转变是十分显著的。

⁶⁹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107-108。

⁷⁰ 孔舒仪，《新马华文抗战小说的“本土性”研究》，页 12。

第五章 结语

铁抗对于很多人而言是陌生的，毕竟没有接触抗战文学的人，将很难注意到马华文坛有“铁抗”这一位作家。铁抗的作品包含小说、散文、文艺理论、戏剧和报告文学，其中小说的成就最高。根据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的记载铁抗所发表的作品有小说集《拥抱》、《试炼时代》、《白蚁》、《洋玩具》、《义卖》、《山花》、《阴影》，散文集《鮫岛，我的第二故乡》、《马来亚的风景》、《寂寞·渔港》，文艺理论集《马华文艺丛谈》以及戏剧集《父》。铁抗作为现实主义提倡者，他的小说基本都会反映社会上种种潜在的问题，其中本文所研究的《试》、《白》和《洋》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方修作为马华文坛的重要学者之一也给予铁抗颇高的评价。方修曾说道：“铁抗这种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跟着时代进步、不屈不挠地战斗的精神，永远是马华文艺界后来者的一个楷范！”⁷¹由此可见，与他同时代的新马华作家相比，铁抗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的种种问题，将这些问题写入他的文艺作品里。

本论文所探讨的《试炼时代》、《白蚁》和《洋玩具》皆是反映了抗战时期马华社会上所面对种种棘手的问题。《试炼时代》揭露了不少战争时期的黑暗面，无论是人性上的丑陋面或者是战场上的血腥面。《试炼时代》是一篇鼓吹抗战时代“家服从国、个体服从集体”⁷²的中短篇小说。铁抗在树立小说主角张建正面的转变的同时加入了不少讽刺性内容。其讽刺性内容包括铁抗对其他角色林寿和张川的人物描写，他

⁷¹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6。

⁷² 朱崇科，〈卓尔不群论铁抗〉，页 55。

们最开始是以嚣张且自私的姿态出场，最后却以落魄的姿态收场。林寿和张川最终付出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白蚁》和《洋玩具》被方修归纳为抗战后期小说。两篇的共同点是作者皆以讽刺手法去创作小说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是《白蚁》揭露中上层阶级人性的丑恶面；《洋玩具》则是讽刺英殖民教育底下人民抛弃民族文化以及崇洋媚外的思想。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铁抗都是以讽刺手法来攻击与黑暗有关的人物或事件。但是这些黑暗面绝对不能是关于生理、心理方面的缺陷又或者是弱势群体在身体、行为上的缺陷。可见铁抗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此外，铁抗艺术作品中的讽刺具有独特功能和效果。小说的讽刺性能让读者理解到，讽刺不会成为一种落后的、不具建设性的表现手法。由此可见，讽刺手法其实在铁抗的抗战文学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铁抗也成功以讽刺手法带出了小说的主题意识，并且发挥了艺术作品的警惕作用。

一篇优秀的小说不但需要作者用语文去塑造人物形象。作者还需要透过人物塑造去反映社会生活，进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⁷³ 历来，就有无数学者提出“艺术作品，必须是一面时代、社会的镜子，从那面镜子中照出众生相。”⁷⁴ 读者可以通过“镜子”去观察一个时代的背景以及社会面貌。铁抗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很深厚的能力。方修给予铁抗的评价提到：“他的小说，技巧圆熟，长于刻画人物性格，渲染环境气氛，同时代的马华作者很少能够企及。”⁷⁵ 本论文是从“社会蛀虫”的方向探讨铁抗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试炼时代》中“坏”的人物形象绝对不仅仅只有林寿和张川，然而笔者之所以会选择探讨他们俩是因为他们的结局让读者清晰的看到坏人不一定会有好下场。铁抗所刻画的人物也间接凸显了他所要表达揭露战争黑暗面的主题。

⁷³ 诸家著，《文艺论坛》，页 22。

⁷⁴ 诸家著，《文艺论坛》，页 22。

⁷⁵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页 2。

铁抗写实的手法也确保了《试炼时代》并不会完全虚构。铁抗的小说更不会出现脱离现实的现象，因为他不会刻意美化与理想化小说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何方修会将《试炼时代》列为铁抗的代表作之一，《试炼时代》既拥有小说的特征，也不乏真实的写照。

《白蚁》和《洋玩具》是较少学者谈论的小说，相较《试炼时代》这两篇的人物塑造则是较为平淡。《白蚁》所展现的是资本家丑恶面。铁抗是以每个不同的人物带出他们在马华救亡阵营的“蛀虫”活动，例如以欺骗手段谋取钱财。《洋玩具》则凸显了人性的丑陋面。铁抗以讽刺的手法揭露在英殖民的教育制度下，人民把民族文化抛弃学习他族文化的现象。铁抗以马奇烈的人物形象间接暴露了 1930 年代马来亚在英国的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伟绩”。

最后，创作风格的转变对一位作家来说是需要面对一个突破的问题。本论文探讨铁抗的三部作品之后发现他在创作风格上有着巨大的改变。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或是小说题材的地方性上的改变。在第四章当中，笔者谈论到铁抗的文艺理论也就是关于“原乡书写”和“本土性”的纠结。“原乡书写”与“中国性（CHINESENESS）”是有区别在于“原乡书写”是作者以中国抗战作为故事题材，带出警惕意识的文艺作品。而“中国性”主要是指向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中国的哲思，如儒、道、释等思想。⁷⁶另外，“本土性（LOCALNESS）”则是在文艺作品中发现许多“南洋色彩”的语言和事物描写。铁抗在《马华文艺的地方性》中所提出的理论都运用到创作里头。由此可见，铁抗的小说充分实践了他的文艺理论。

⁷⁶ 许文荣，〈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论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页 40。

综上所述，铁抗的文艺作品非常值得研究，铁抗南来的创作生涯非常短暂，但是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却有着很高的质量，值得被马华文坛敬重。本论文仅仅研究铁抗的三部小说，然而关于铁抗的其他文艺理论、散文、报告文学以及戏剧方面仍旧值得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马华文坛抗战文学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反黄、揭露抗战时期社会的黑暗面等。⁷⁷对比马华文坛的抗战文学，铁抗在人物的描写方面更为凸出。铁抗笔下的人物性格和行为可以反映抗战时期的社会面。换言之，读者可以通过铁抗对人物的描写进一步了解当时社会甚至是了解整个时代。由于本文只处理了铁抗的抗战文学，并没有加入其他作家的抗战文学进行比对。故而，这也是本论文的局限性之一。抗战文学的范围非常广，马来亚、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作家书写抗战文学的方式亦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这个议题非常值得去对比的。

另外，本论文所探讨铁抗三部小说中的“原乡书写”以及“本土书写”非常值得深入探讨。首先这两个概念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然而本论文仅仅是从小说题材以及语言的运用进行探讨。笔者经研究发现，以中国抗战作为故事题材，带出警惕意识的文艺作品既是作者运用了“原乡书写”。反观，一部富有“南洋色彩”的语言和事物描写的小说则是“本土性书写”。除此之外，原乡书写、中国性、本土性和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例如铁抗的地方性的概念底下有原乡书写以及本土书写，这是本论文中没有详细解析的部分。故而，笔者希望往后会有更多学者研究铁抗文艺理论是如何实践在其抗战文学之中。

⁷⁷马崙，《马华文学之窗》，页 13。

引用书目

专书

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铁抗作品选》，上海：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1979。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马来西亚：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1。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马来西亚：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1。

方修，《新马华文学简史》，新加坡：星洲万里书局，1974。

骆明，《新华作家研究丛书（6）铁抗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社，2006。

马崙，《马华文学之窗》，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7。

冉欲达，《文学描写技巧》，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王先霏，胡亚敏编，《文学批评原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左翼文学（1926-1976）》，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2009。

许文荣，孙彦莊，《马华文学十四讲》，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许文荣, 孙彦莊, 《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 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2。

张锦忠, 黄锦树, 《别再提起: 马华当代小说选(1997-2003)》, 台北: 麦田出版, 2004。

张锦忠, 黄锦树, 庄华兴, 《回到马来西亚: 华马小说七十年》, 马来西亚: 大将出版社, 2008。

诸家, 《文艺论坛》, 马来西亚: 马新印务有限公司, 1983。

期刊论文

蔡洞峰, 〈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页60-61。

曹万生, 李琴, 〈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页87。

廖燕, 〈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解蔽”内涵〉, 《安康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页96。

许文荣, 〈马华文学中的三江并流: 论中国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的微妙同构〉, 《华文文学》2010年第96期, 页40。

朱崇科, 〈卓尔不群论铁抗〉,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4期, 页53-54。

学位论文

陈岸怡，《铁抗文学作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6。

黄宝琪，《马华文学中峇峇娘惹的形象刻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士学位论文，2011。

孔舒仪，《新马华文抗战小说的“本土性”研究》，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

英文参考书目

Tan Chee Beng.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88.